

余三乐 著

早期 西方传教士 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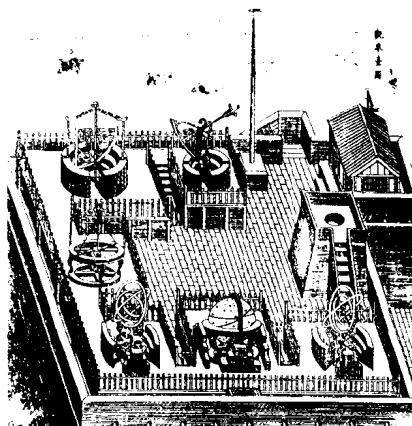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

余三乐 著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余三乐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ISBN 7 - 200 - 04335 - 4

I. 早… II. 余… III. 明末清初一西方传教士—中西文
化交流 IV. B97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624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

ZAOQI XIFANG CHUANJIAOSHI YU BEIJING

余三乐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 32 开本 13.25 印张 297 000 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ISBN 7 - 200 - 04335 - 4

K·452 定价: 22.00 元

序 言 (一)

李 申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是余三乐先生的新著，我以先睹为快。

这是一部关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专著。

作者以北京西方传教士墓地为线索，通过对一些墓主生平故事的叙述，论述了从明万历到清乾隆二百年间在北京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事实和耶稣会士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以及传教士墓地——这一历史文化遗址在近代政治斗争中经历的风风雨雨，发人深思。

本书论点明确，材料丰富，特点是：

(一) 历史联系实际，以北京西方传教士墓地所经历的沧桑，说明改革开放、扩大对外交流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二) 17—18 世纪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个重要时期，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张诚等许多耶稣会士相继来华，带来了西方哲学思想和科技文化，打开了中国学术界对另一种文化的眼界，增加了许多实用科技知识，而中国的灿烂文化，也于此时经由耶稣会士传到欧洲，使西方在政治、哲学、艺术等方面受到影响。这是耶稣会士的贡献，开启了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至今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课题仍在进行研究，其原因也就在此。作者在书中将此作为重点，对耶稣会士所做的大量

工作做了详细说明，内容丰富。

(三) 对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和贡献，见解不同。有些中外学者认为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是落后的科学，否认其中有近代科学技术的内容，作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虽然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并不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但对中国来说，却是闻所未闻的。”明确肯定了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

(四) 广泛占有资料。作者对利玛窦研究情有独钟，曾对利玛窦所到之处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到国外访问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四人的故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和图片。书中对以上诸人，特别是对利玛窦叙述颇详，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五) 书中对北京传教士墓地的变迁，修复利玛窦墓地的经过和耶稣会士的碑文，记载详尽，是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有用资料。

(六) 导言“17—18世纪的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作者用力最多的一章，时间跨度达两个世纪，叙述了自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后在这里发生的“西学东渐”的事实，并对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原因从宏观进行了探讨分析，是一篇学术研究之作。

(七) 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本书既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也是一部耶稣会士传记，对于研究中外关系史、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读者来说，是一部有用的书。

2000年8月于北京

序 言 (二)

张西平

就今天的世界来说，它的源头是 15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1492 年哥伦布对新大陆的发现拉开了世界全球化的帷幕，这个被称为“创世以来的最大事件”，终于使欧洲人走出了狭小的大西洋西岸，并最终使其第一次具有了一种真正的“世界眼光”。一个“欧洲人挑战世界”的时代到来了，在美洲，“四十年来，有一千二百万生命，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基督教徒们的专制和罪恶之手。”资本的原始扩张使其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历史在资本的罪恶中前进。

当西班牙人在北美烧杀抢掠之际，葡萄牙人从马六甲海峡驶进中国南部海域时，却遇到一个比欧洲文明还悠久的历史过程。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桥梁的就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从公元 1500 年到公元 1800 年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以传教士为中介，中西双方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并对双方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840 年，当英国人的炮舰轰毁虎门炮台时，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互动就基本结束了，西方列强的入侵与中国民族的觉醒和反抗构成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最悲壮的历程。

本书的作者写的是中西初识的前三百年历史，其切入点就是入华耶稣会士。作者以埋葬在“滕公栅栏”墓地的耶稣会士为线索，将历史文献的梳理与实际的田野考察融为一体，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又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对中国前近代史的研究，对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近年国外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从“传教学”范围向“汉学研究”转变，即研究的重点已不仅仅局限于传教士，而是将这种传教活动与中国社会的反应放在一个统一的历史平台上加以考察，其代表性成果就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和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的《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就中国来说，自陈垣、向达、方豪开辟这一研究领域以来，30—40年代曾达到过很高的研究水平。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从80年代以来才得以真正恢复，其标志就是陈卫平的《第一页与胚胎》和林金水的《利玛窦与中国》、孙尚扬的《明末儒教与基督教》、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等著作的出版。

但若真正推进这一学科的进展，有以下四个问题是应特别注意的：

第一，明清间天主教史汉文文献的整理。入华耶稣会士用中文写下的著作初步统计有1000多部，大陆学者能读到的约200多部，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依据这200多部著作来展开的。这个数字足以说明目前研究的现状，难怪台湾学者黄一农曾尖锐地批评大陆研究的现状，认为除“少数人之外，在原始文献的掌握上亦嫌不足”。基本文献的缺乏使

许多研究鲜有创意。许多文章实际上是在重复方豪等人的研究，这不仅对于个体研究者，对于这一学科的整体进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之下，台湾学界所出版的《天主教东传文献》（1—3）以及最近出版的《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1—4），都表明了他们对基本文献的重视。荷兰莱顿汉学院院长、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所领导的课题组已出版了西方文献中对入华耶稣会士研究的论文和著作目录（Bibliography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据说有关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目录也在编制中，即将出版。做好此事当然有许多困难，因不少基本文献藏于国外，但并非困难得不可克服，因而大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仅仅做一些恢复性的工作已远远不够，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若有所突破必须从基本文献的整理入手。我们在这方面并非毫无作为，如近年来许多明清档案整理公布，许多方志已可查阅，这说明了在整理汉文文献上，中国学者仍大有用武之地。

第二，明清间天主教史西文文献的翻译。入华传教士的历史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学东渐”的推动，一是对“中学西传”的推动。对于后一方面的研究早在30年代便有冯承钧、朱谦之、陈受颐等前辈学者开拓，但若同“西学东渐”的研究相比，显得不足。对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早属于西方汉学史的一部分，它同时属于明清间天主教史研究的一部分。这方面虽然西方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待开发的文献仍十分巨大。由于这些文献涉及多种语种，要求中国学者一一掌握是不可能的，因而组织人力系统翻译这些文献是项基础性的工作，在翻译中应秉承前辈学者的学风，做到一丝不苟，同时对于长期从事这些文献翻译的研究者应给予尊重，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使更多的中国学者使用上

了这些文献。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在这个领域中中国学者较弱的正是对这一部分文献的掌握，因而此项工作对国内学术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意义重大。

第三，对耶稣会以外其他修会的研究。明清间入华的天主教修会除耶稣会外还有道明会、圣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都集中于耶稣会的研究，对其他修会做系统研究的较少。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方面，但相比之下仍是薄弱环节。

第四，把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放入中国史与世界史之中加以考察。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裂”的巨变时代，如何评价耶稣会所带来的“西学东渐”，如何理解传教士在明清间中国思想文化史演变中的作用，历来有不同说法。近年来的研究已日益摆脱一种僵化的评价模式，较为客观地评价入华耶稣会士的地位，有些研究成果很有说服力，如江晓原对明清间传教士在历局中的作用的研究，但总的来讲仍有待加强。胡适说近代以来中国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小”。“天学”与阳明心学后的“实学”究竟什么关系，西学对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方以智影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有待逐一研究。最近北大哲学系张学智先生的《明代哲学史》中已专列一章“明末天主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说明已把明代天主教史放入整个明代哲学史加以考虑，这个思路是对当年何兆武先生《中国思想史》所写章节的一个恢复。不仅仅是思想史，在社会史、科技史、政治史等方面都有待深入。台湾学者黄一农近年发表一系列论文，其研究深度要高于大陆学者，很值得一读。就世界史来说，目前正处于世界体系更换时期，以欧洲中心

主义所构造的世界体系日益显示出弊端，而明清之际的中西相遇正是建构新的世界体系的最重要事件，因而我们需放开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来把握明清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欧洲的利益之争对“礼仪之争”的影响，耶稣会在欧洲的命运以及它对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天主教在北美传教与东亚传教之比较，中国在当时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新的世界体系下加以说明。

在中外关系的研究中，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若与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相比，它有更多亟待开发的领域，它是我们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时最重要的一个时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一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所有的研究者都应以开放的心态，欢迎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以更加热情的姿态与各类不同学者展开积极对话。“学术乃天下公器”，在这一领域中表现的最为典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无法穷尽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评判也决非一些狭小的学术机构所能决定。学术成果的评判、学术事业的推进只能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中完成。作为中国学者，还应用新的理论眼光来审视和接受国外的研究成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领域中同样存在着一些“话语霸权”。

总之，本土研究的加强和解释理论的更新，史学方法的变革，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只有这样这一领域才会有新的突破，整体研究水平才会有新的提高。

我所以为余三乐先生这本书做序有两个原因，其一，他

是近年来新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愿为后来者鼓与呼，因为这一学科需要更多的学者进入；其二，这本书鲜明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本土研究的特点，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就在他的办公室旁，对其碑文的研究他得地利之先。另外，作者沿利玛窦进京路线进行实地考察，逐一核对书本史料，其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不懂拉丁文，不懂法文，不懂葡萄牙文的中国学者同样可以找到进入这一领域的切入点，同样可以做出令同行敬佩的成果。

承三乐好意，要我做序，使我有幸先睹为快，从中获益匪浅。愿三乐兄再接再厉，不断有新著问世。

2001年2月

北京永定路东街6号游心书屋

前言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书，是以小小的一方空间为线索，交织着近百个人物，跨越近四百年时间的故事。这些人物不是普通的人物，他们是从遥远的欧洲，闯过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难，长途跋涉，而到中国、到北京来的；他们的身份是天主教的神父，却同时又是博学多闻、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且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的角色。由于他们的出现，作为封闭帝国的都城的北京，在 17—18 世纪居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很长的时间内，本书所涉及的这段历史，由于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种种原因，在国内外都曾经被忽视、被遗忘，存在着一些不公正的认识。

而今天，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在日益开放的中国，人们才又重新审视它，还它本来的面目。17—18 世纪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目前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堪称是一门“显学”，不仅作为当事者的国家——中国（包括大陆、台、港、澳）、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此课题情有独钟，就连当时尚未建国的美国、加拿大等国也有诸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此乐而不疲，而且有很多成果超过我们。

1980 年，我因被租用北京市委党校办公楼的《学习与研

究》杂志社录用，而走进党校校园。每天早晨打开水时，都要从安放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神父墓碑的小院前路过。当时我对他们还是陌生的，也全然不知在这静静的墓地旁曾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1985年，我调进了党校，任校刊编辑，负责文史类的稿件。1987年，我在哈尔滨召开的两年一度的国际明史研讨会上，看到两篇对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的功过进行再评价的论文，突然因为自己与伟人的英灵朝夕相处，而对此等文章颇感亲切。会后，在初步查阅了有关这一课题的论文的基础上，写了《关于利玛窦和耶稣会士的几个问题》一文。这是我关注这一课题的开始。

1990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梧桐先生的鼓励下，我参与了由侯仁之教授任总主编、陈梧桐先生任常务副主编的《黄河文化》一书的写作。陈先生分给我的一章就是元、明、清时期“频繁的中外交往”，其中“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内容占了相当的比重。为此，我对这一课题做了粗浅的研究。

1990年秋，钟情于历史学科的我，为了进一步深造，上了党校的党史专业的研究生班。第二年，原文史教研室主任高智瑜老师调任研究生部主任，她曾受校长的委托，较早地涉及了有关利玛窦和埋葬在我校校园内的传教士这一领域的研究。1992年，高智瑜教授正筹备编辑《历史遗痕》一书，研究生毕业后的我非常有兴趣参与。于是在王子恺校长和高智瑜教授的支持下，我调入当时兼挂“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所”牌子的研究生部工作。在访问了参与墓地修复的文物局吴梦麟老师、党校原校长高毅民同志和负责基建和房管的徐万泽、郝观三等同志，以及原上义小学教师张瑞亭先生等当事人，又参考了一些有关史料之后，我撰写了题为“几度沧

桑说“栅栏”一节的文字。

在对当事人的访谈中，我了解到在1978年底重修利玛窦墓地时，有一份经高级领导批准的重要文件。1993年的冬天，我骑着自行车走访了好几个单位，在文物局档案室没有找到，后来终于在民政局的档案室找到了。这卷档案有：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最高领导人圈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写的关于修复利玛窦墓地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此事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信函，许涤新主持的、有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参加的讨论如何修复墓地的会议纪要等珍贵文献，以及1958年文物普查时墓地的资料。我特别注意到，做出关于修复利玛窦墓地的决策是在1978年10月间，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在《利玛窦墓地修复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今天看来，修复一处古墓，树立一尊石碑，是何等寻常的小事。然而在十几年前，它确实惊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最高领导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圈阅许涤新同志报告的时间在1978年10月的4—24日之间，这恰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通过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中国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已经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开放国门、学习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内部讲话。地火正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之下涌动，改革开放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这是宋代文豪苏轼描写春江晓景的诗句。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墓地的修复，不正预示着中国的科学技术政

策、对外政策和宗教政策将进行重大调整吗？它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将要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信号吗？

我由此而意识到，这处似乎离人们现实生活很远的一方外国传教士墓地，其实是和几百年来中国的政治生活有着那样密切的联系。

在这里，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是不得不提到的，爱德华·马拉泰斯塔（Edward J. Malatesta），已故的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和所长，一名现代耶稣会士。他自幼就对中国十分向往，年轻时立志要以利玛窦为榜样到中国来传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会实行了“三自”方针，他的愿望不能实现，但他向往中国的初衷不改，并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中文听说能力。“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到中国来，差不多每年都来，甚至一年几次，直到1998年逝世这近20年间，他总共到中国31次。在上海他创办了友谊图书馆，在北京他与我们共同撰写了记录“栅栏墓地”历史的《DEPARTED, YET PRESENT ZHALAN THE OLDEST CHRISTIAN CEMETERY IN BEIJING》一书（本书原计划以中、英、葡三种文字出版，但至今只出了英文版），由澳门文化署于1995年出版。1993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旧金山时，亲切会见了，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的道德与学问对我和我的同事们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超越了浅层的、一般性了解的阶段后，我思索如何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一步的研究。我发现，对我来说，要从检索文献上有所突破，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关于“西学东渐”的原始资料浩如烟海，绝大多数的外文资料不是英文的，而

是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的，在挖掘外文资料上，我没有任何优势。至于中文的史料，港台学者多少年来不停顿地梳理，“后来”之我也绝无“居上”之可能。我认为，大陆学者的优势在于“地利”，于是突发了考察利玛窦旧址（居住过的和路经过的）的奇想。在党校的支持下，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基本线索，我先后考察了肇庆、南昌、九江、赣州、南京等地，去寻访利玛窦的足迹。果然收获不菲，起码加深了对札记中很多描写的感性认识，甚至纠正了某些书籍中的错误。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利玛窦江西遗址考察记》、《利玛窦南京遗址考察记》和《利玛窦中国遗址考察初记》等文；更进一步利用所拍摄的照片，与同事合作制作了《寻访利玛窦足迹》的多媒体光盘。继续考察利玛窦的其他遗址，是我今后立志完成的夙愿。

1996年，某出版社拟订了一套总题目为《中国文化杂说》的大型丛书计划，任主编之一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邀请我就“滕公栅栏”传教士基地的历史撰写一个题目。我以《群星陨落之地》为题，将这些年研究、调查的收获做了初步的总结。该书于1997年出版，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雏形。由于这是全套书上百个题目之一，受到很多限制，字数不能超过10万，不能插图片，引文不标注释等等，总觉得意犹未尽，有些遗憾。

此次，有幸得到党校领导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小组的支持，有机会尽己所能，补充上四年来的研究所得，将此题目写透。一方面，由于这期间到美国进修了一年，英语程度有了提高，虽然面对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的原始资料仍然是一筹莫展，但毕竟可以直接阅读国际上当代的研究成果了，从而使自己的眼界大大扩

展。另一方面，1999年应德国汤若望协会和意大利某研究所的邀请，我作为我校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和戴进贤四人的家乡，不仅增加了真切的感性认识，也得到了很多文字和图片资料。再一方面，这几年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方便。这几方面加在一起，使书稿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不仅旧有的章节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扩展，还新添了若干章节，特别是增加了题为“17—18世纪的北京——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的导言。

这篇导言，既是对始于利玛窦进入北京之后的两个世纪间发生在北京的被史家称为“西学东渐”的那段特殊历史的概括，也包括对其形成的宏观与微观的原因的探究，同时提出了对在北京的经过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幸运地保存着的有关“西学东渐”的若干遗址文物进一步加以保护和利用的建议。以此作为对利玛窦进京400周年的纪念，我想也是合适的。

乍看起来，一两处古老的墓地，几十尊斑驳错落的墓碑，以及和它们相连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故事，似乎与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大业距离甚远，其实，历史是现实的老师，了解这段历史可以启示中国人：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和科学的部分，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牢记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闭关自守、否定一切的教训，从而增强实行对外开放的自觉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不是也昭示我们要正确对待人类先进的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吗？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段历史可以表示中国人民对远道而来、友好相处、平等交往的各国文化使者的最终的肯定；而对那些目空一切、“优越感”极强的人来说，则可以告诉他们，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的交往必